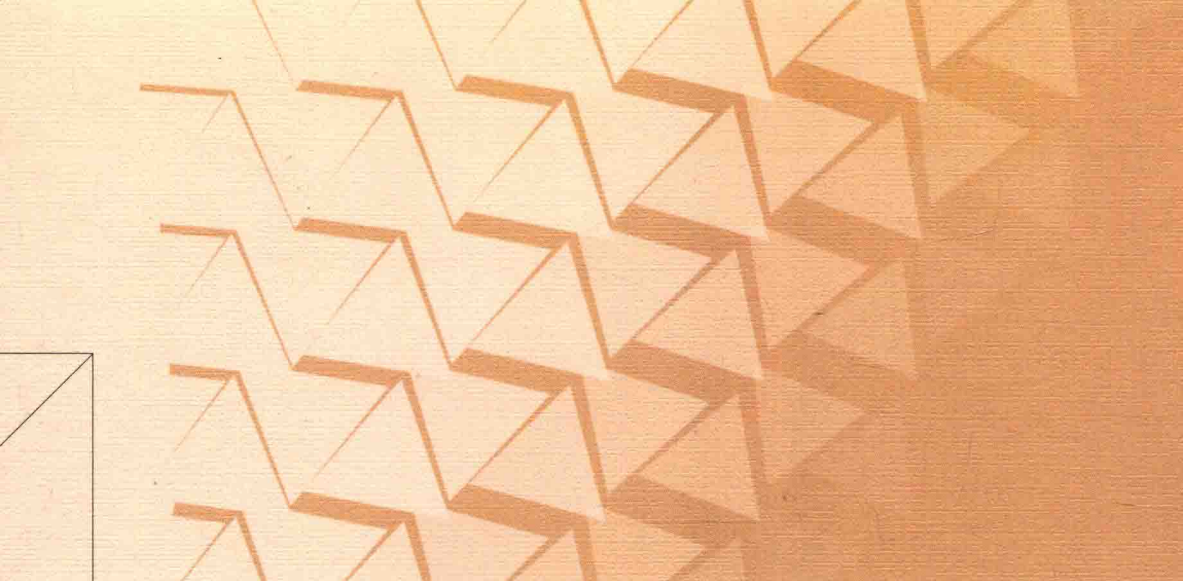




产业集聚、结构转变 与经济增长

朱昊 著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产业集聚、结构转变 与经济增长

朱昊 著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业集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朱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203 - 0858 - 8

I. ①产… II. ①朱… III. ①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中国
IV. ①F269.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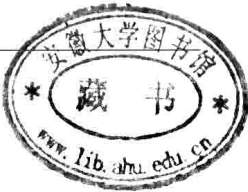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43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6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始终是紧密关联的两条主线。这两条分别基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延伸演化的脉络相互依存并交织，生动地叙述着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兴衰起落的故事。与此同时，沿着经济增长理论演进的长河回溯，可以发现结构转变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便已被纳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域，而随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也日益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然而，尽管产业结构转变和集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济增长的实践中均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目前却鲜有在增长框架下同时考虑结构转变和集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我们认为，从发展的视角审视经济增长的历程并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就必须将结构转变和集聚的视角加以结合。在我国目前亟须深入挖掘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宏观背景下，注重集聚效应的产业结构转变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持续的活力。因此，本书致力于从各个层面全方位深入考察结构转变过程中集聚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得出无论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还是制造业部门内部的结构转变与升级，都离不开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的结论。

首先，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视角出发，本书探讨了产业集聚在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产业部门转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本书以我国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为背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两部门增长模型探讨城市化过程中的结构转变和集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并进一步利用我国 1998—2012 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分析的主要结论表明，从集聚和结构转变的双重

视角出发，更能解释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区域经济增长表现的差异，注重集聚效应的城市化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次，本书基于现代非农产业部门内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转变以及产业关联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本书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共同集聚与结构转变的现代产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集聚在现代产业部门内部结构转变过程及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然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全国 225 个地级城市的微观数据构造反映共同集聚程度的指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 GMM 估计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考察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显示，总体而言，共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与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共同集聚增长效应的发挥。进一步地，从经济规模看，大城市共同集聚的增长效应显著优于中小城市，而从细分行业的产业关联性看，关联性更强的行业部门的共同集聚也表现出更强劲的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再次，本书将研究的视角进一步聚焦于制造业部门内部的结构转变与集聚问题。具体而言，该部分研究主要关注集聚视角下制造业部门结构升级以及集聚形式（专业化或多样化）的选择问题。关于前者，本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能够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的三类统计指标，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集聚在整体上能够通过影响制造业部门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绩效起到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地，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集聚效应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城市仍然体现出在集聚增长效应方面的优势。关于后者，本书参照变异系数构建了反映城市制造业部门专业化或多样化程度的指标，并通过实证检验研究我国的城市发展究竟更多受到由专业化带来的马歇尔—阿罗—罗默外部性（简称 MAR 外部性）还是由多样化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影响。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虽然从全国整体上看，专业化或多样化程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明显影响，但两者在不同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城市内部的增长效应存

在显著差异。大城市主要获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好处，而中小城市则主要受 MAR 外部性的推动。

最后，本书概括了主要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并着眼于推动城市和区域发挥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的政策建议。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路径和方法	9
第三节 结构安排	11
第二章 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评述	18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结构转变思想	18
第二节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结构转变分析	22
第三节 实证研究视角下的产业结构转变与增长	41
第三章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评述	46
第一节 古典区位理论：最初的尝试	46
第二节 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困境与空间不可能定理	53
第三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集聚与增长的视角	60
第四节 “新” 新经济地理学在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上的 若干创新	68
第五节 实证研究视角下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71
第六节 小结与讨论	78
第四章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二元结构转变与区域经济增长	79
第一节 集聚、二元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一个可供深入 研究的理论模型	79

2 / 产业集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第二节	对模型假设和构建的几点说明	85
第三节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88
第四节	小结与讨论	97
第五章	几大产业关联和集聚中的城市经济增长	99
第一节	关于第二和第三产业集聚主要文献的回顾和 理解	100
第二节	第二和第三产业共同集聚、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 一个理论模型	102
第三节	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共同集聚之经验性事实的 考察	109
第四节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118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133
第六章	制造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	135
第一节	对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主要研究文献的 相关解说	135
第二节	基于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现状的经验分析	143
第三节	集聚视角下的制造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一般 图景分析	151
第四节	小结与讨论	156
第七章	制造业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生产率差异的分析	158
第一节	对专业化与多样化相关理论文献的回顾与评说	158
第二节	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之模式争论的理论和 经验分析	171
第三节	马歇尔外部性还是雅各布斯外部性：拓展的 视角	189
第四节	小结与讨论	200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202
第一节 主要结论	202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06
第三节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209
参考文献	21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经济就步入了高速增长的时代。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速接近 10%，在进入 2000 年以后，年平均增速更一度达到两位数以上，如此斐然的成就举世瞩目，被许多国外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冠以“中国奇迹”的称谓。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从 2010 年起，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其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为 2008 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的结果。2007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仍高达 14.2%，但到了 2012 年，该增长率已经降到了 7.8%，2016 年第二季度更是跌至 6.7%。我国政府于 2008 年推出的总额为 4 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和 10 万亿元的信贷支持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如愿带来经济持续的复苏反弹，反而带来了需要进行长时间消化的巨额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2016 年 6 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为 50%，较 5 月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正好位于国际公认的荣枯线上。同时，根据 2016 年 1—6 月的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 PPI）同

比下降了3.9%，降幅较1—5月缩窄0.2个百分点。其中，6月的PPI同比下降了2.6%，环比下降了0.2%，已连续52个月保持负增长的态势。虽然PPI的降幅出现了连续6个月缩窄的反弹势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出现回暖迹象，但主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仍表明制造业在继续萎缩，各项指数大多显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这加剧了人们对我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并使寻找和开发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潜力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60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迈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接下来，如何进一步调动经济体中的积极因素，使我国逐渐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关于这一点，世界银行在其于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一概念。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经常出现，受困于这一效应的制约，鲜有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不仅如此，这些国家往往还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前沿和尖端技术研发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以往的国际经验显示，以阿根廷、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徘徊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较短时期内难以见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争论，许多批判者认为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同时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历程也显示它并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即便如此，国内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确实面临诸多问题，如劳动力供给面临“刘易斯拐点”、资源的高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创新动力的缺乏、社会阶层的固化和收入差距的拉大等，这些都导致我国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将面临增长源泉的枯竭，并将

最终造成增长的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的结果。实际上，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这就需要重构新的增长动力，挖掘新的增长潜力，实现增长动力和增长机制的转换，因此，对于增长动力和潜力的系统性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内的相关舆论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强调完善市场体制的作用，或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或强调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或强调刺激和扩大内需，不一而足。2014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新动力是促改革、调结构和改善民生。实际上，对我国增长动力的不同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理论依据。在主流经济学中，人们讨论增长动力问题所普遍借助的分析框架通常无外乎着眼于长期供给的新增长理论以及关注最终产品需求和短期波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般而言，经常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津津乐道的就是由部分凯恩斯主义者所倡导的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若从最终产品需求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而在消费增速缓慢、净出口萎缩的状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得更加不可或缺，但由于投资的主体常常是政府，再加上投资的边际收益不可避免地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私人投资的进一步萎缩、产能过剩以及投资效率的低下。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在急剧的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之间实现“再平衡”的严峻考验，增长的动力应从投资转向拉动消费。

但是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并不适合分析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就长期增长动力而言，我们的分析视角仍应集中于供给方面，应关注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根据新增长理论的观点，资

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的投入都将面临边际报酬递减，只有人力资本的提升、知识的积累以及技术创新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来源。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大部分国内学者均认为，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投入，并通过资源的消费来维持经济的增长，TFP的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走的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之路。通过对TFP的分解，还可以进一步观察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各自的作用，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关于技术进步增长效应方面的结论仍然不够统一。总之，基于新增长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其中又主要包括效率的改进和技术创新，前者体现为现有技术和资源约束下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后者则来自生产技术前沿的推进。因此，要实现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向效率和创新驱动的转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技术创新的程度？基于新近的经济理论与现实，我们认为，“结构”是其中的关键和核心。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与创新机制及其对增长的影响一直是核心议题，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融合，发展经济学所强调的结构转变对增长的影响也日益得到重视。事实上，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出现了逐步融合的趋势，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变问题重新被纳入了增长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阿吉翁和豪威特（Aghion & Howitt, 2009）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发展经济学家从合理性的角度质疑了现有的总量形式的增长模型，而要从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增长，就不得不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另外，班纳吉和杜弗洛（Banerjee & Duflo, 2005）首次指出了部门间的再配置作为一种主要的增长引擎的重要性。林毅夫和苏剑（2014）在其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中也强调了结构转型和升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当然，这里所提到的结构问题一般指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同时，经济结构不仅包括产业部门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还包括长期被忽视的空间结构。近年来，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学

科的复兴和兴起将集聚这一表征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指标重新纳入增长研究的主流领域。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会影响创新。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可以发现恰如人类经济发展史所展示的那样,经济发展过程密切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这也体现为发展史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从发展的视角探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对于依然处于深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透过发展看增长,其核心在于探究增长过程中结构转变和集聚的影响和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借助结构的视角,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以及二者联动的层面考虑其对效率和创新的影响,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力。

另外,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动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伴随着经济总量持续快速的提高,而且伴随着产业结构在长期内显著的变动。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技术水平的持续发展,产业类别以及产业部门的数量也日益增多,这就使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产出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各个产业彼此之间通过前向与后向关联效应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系统网络。这也意味着各类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正在日益提高,产业之间的结构效应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依靠廉价要素投入而迅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资源“瓶颈”约束和环境压力,依靠加大传统要素投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建立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其中,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产业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塞尔奎因(Chenery & Syrquin, 1989)在其著作《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做出了简洁的说明,即经济体的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以及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若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

素从生产率水平较低或者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产业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或者具有生产率高增长率的产业部门,总体的生产率水平也会得到提高和改善。这种基于要素流动而产生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体增长率的贡献被概括为“结构红利假说”(Kuznets, 1979; Pender, 2002)。自该假说被提出之后,国外相关研究开始致力于验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产业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所谓“结构红利效应”(Timmer & Szirmai, 2000; Fagerberg, 2000; Pender, 2002; Singh, 2004)。而近年来,测算我国“结构红利效应”大小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大部分研究均表明我国的“结构红利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为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该效应有逐步减弱的趋势(蔡昉和王德文, 1999; 吕铁, 2002; 李小平和陈勇, 2007; 李小平, 2008; 干春晖和郑若谷, 2009; 苏振东等, 2012)。这也契合了鲍莫尔(Baumol, 1967)所提出的“鲍莫尔成本病”概念(也称“渐进停滞理论”)。^①因此,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对于解决如何让产业结构转变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继续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这一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与之相对应,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也同样对经济增长的过程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经济活动的最主要载体——城市便可以视为集聚经济发展的产物,现代产业部门(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集聚和发展是城市经济兴起和增长的前提,而进一步地,产业分工、专业化和多样化又共同构成了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即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体系。一般认为,集聚经济通过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集聚经济的规模决定了城市规模。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在于经济活动集聚所产生的共享、学习和匹配效应(Duranton & Puga, 2004),而这三种效应又共同作用于创新能力的提

① 鲍莫尔(Baumol, 1967)和福切斯(Fuchs, 1968)利用一个两部门非均衡经济增长模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部门将同时出现就业增长较快与生产率增长滞后的现象,从而使其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出现“成本病”,影响产业结构转变的增长效应。

升。在当代,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和经验事实都表明了伴随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产业集聚和扩散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根源。正如前所述,产业集聚的规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产业分工模式演变又会导致城市体系结构的相应改变,因此,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绩效差异时,集聚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

二 研究意义

纵览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历史,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演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随着近年来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学科间交叉融合趋势的不断加强,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新兴学科渐渐被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所强调的集聚因素也日益受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视。在今天,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演变问题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研究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参见阿吉翁和豪威特(Aghion & Howitt, 2009)以及亨德森和蒂斯(Henderson & Thisse, 2004)的代表性著作]。我们认为,基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立足于发展的视角探究经济增长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和必要,而要正确地透过发展看待增长,就必须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变与空间集聚因素同时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另外,正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史所揭示,城市的发展过程恰恰正是城市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聚散演变的过程,城市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了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两者共同描绘了世界主要城市兴衰起落的壮阔图景。世界银行(2009)的发展报告《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也揭示了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从城市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探索经济结构、集聚活动的动态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进一步地,考虑商品与服务贸易及交通运输等因素,在城市经济增长模型中建立各城市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从而将以单一城市为基础的分析框架拓展至多城市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更科学地审

视城市群背景下的经济结构转变与集聚现象，更精确地透析城市群发展的历程以及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的机理，为城市群的增长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

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可以发现虽然在过去的三十余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长期高速增长（GDP 年均增速高达 9% 以上），但在经济结构的转型程度以及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的发挥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15 年，我国三次产业部门的产值比重为 9:40.5:50.5，其中，第三产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在历史上首次突破 5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正在逐步实现国民经济主体从第一、第二产业部门向第三产业部门的平稳过渡，另一方面也说明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进程相比依然大大落后。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大致与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和英国 19 世纪 80 年代的产值结构相当，就业结构更是只相当于美国 20 世纪初和英国 19 世纪早期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科学化、高端化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克服。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尽管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显著特征的结构转变进程在我国的各个区域均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势，但是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绩效却大相径庭。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主要可以归因于各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效应不尽相同，在肯定经济结构转型对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结合考虑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同时，国家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构建产业新体系的目标，其中着重要求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和培育现代服务业，另外也对区域经济总体布局以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布局做出了整体的统筹规划。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努力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而且要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经济资源，大力培育以城市群或经济带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增长极，使其更好地发挥产业内部的集聚效应。总而言之，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形态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分析一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前景的重要依据。从结构和集聚的视角审